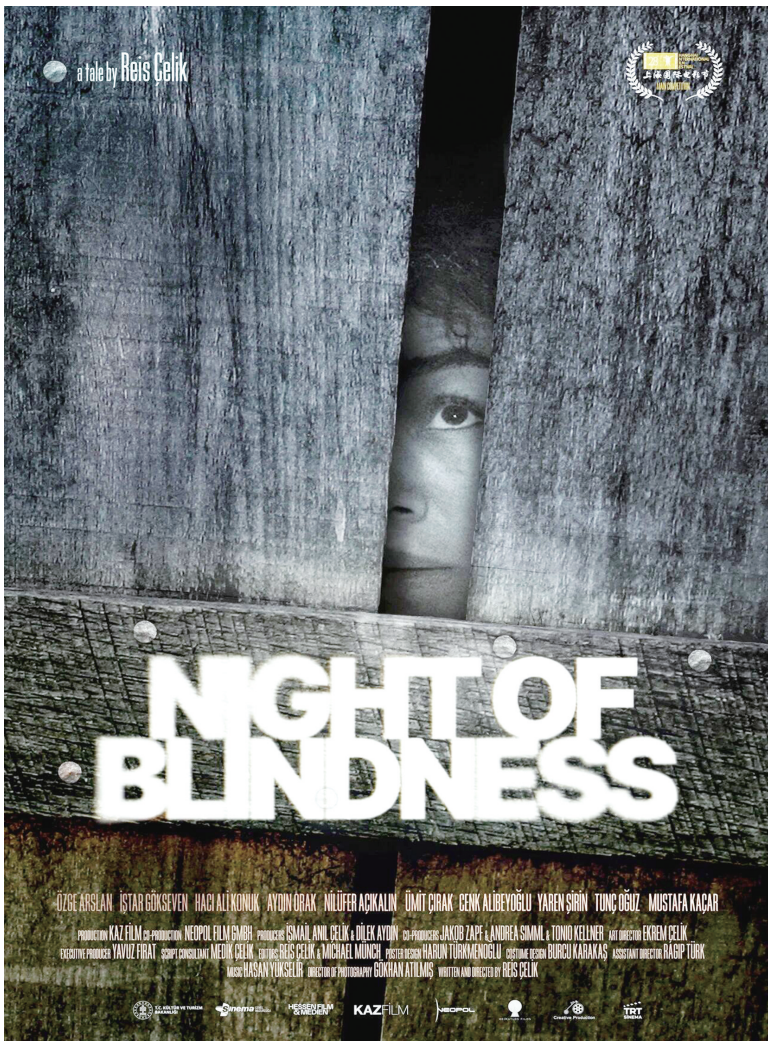


真正的英雄

简平



电影《无人看见的夜晚》海报

世人瞩目的全球 A 级电影节——第 28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共有 12 部影片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土耳其的《无人看见的夜晚》最终荣获金爵奖最佳编剧奖，可谓实至名归。

1980 年的土耳其，夜色如墨。在伊斯坦布尔某处尚未完工的建筑工地上，一名叫法特玛的左翼活动家被藏进了即将浇筑混凝土的立柱模板中。狭小、黑暗、即将凝固的空间，成为她存活最后屏障。而在她身边，一群普通的建筑工人，用他们的沉默、镇定和智慧，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守护。

《无人看见的夜晚》是土耳其导演雷斯·塞里克根据自身真实经历改编的作品。影片最打动人心之处，并非革命者本人的英勇，而是那些环绕着她的普通人——他们没有名字，不问政治，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左翼右翼，却在法西斯政权的枪口下，用最朴素的方式保护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名英雄。

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角色，是工地上那位被大家叫做“打井”的烧水工。他独自住在工地宿舍的烧水屋里，门外除了有一口井，就是一排混凝土立柱。当前来搜捕的宪兵打响第一枪的时候，他就将正和工地上的人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的法特玛藏匿到了混凝土立柱模板里。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工人，成为了整个救援行动中最关键的一环。当宪兵层层封锁现场，当审讯步步紧逼，当所有人都处于恐惧之中时，“打井”却展现出惊人的镇定与胆识。

宪兵们在工地上来回盘查，他们特别怀疑“打井”，反复审问，用笔让他写字辨认字迹，用枪将他隔离起来，后来又故意让他在宿舍上下跑来跑去，差遣他给宪兵烧水倒茶，甚至建筑公司老板也赶来要求立刻开工浇灌混凝土——“打井”始终不动声色。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破绽，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每一次被询问，他都表现出毫不知情的神色；每一次被试

探，他都能安然通过。这一切靠的不是什么天生的演技，而是源自内心的勇气和对正义的本能认同。

在漫长的黑夜里，“打井”趁宪兵不备，悄悄走近那根混凝土立柱，背靠在冰冷潮湿的模板上，对着里面的法特玛轻声说：“不要害

怕，不要动。”短短一句话，却蕴含着无限的温暖与力量。他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对另一个困境中的人，发出最质朴也最坚定的承诺。

包工头的女儿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法特玛。她送给法特玛一

只洋娃娃，在宪兵到来后，她不断地说要寻找那只洋娃娃。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孩子任性的行为，但镜头一次次捕捉到她目光中那种超越年龄的关切——她寻找的哪里是洋娃娃，分明是在确认法特玛是否安全。童真的外表下，是一颗懂得善恶是非的心。

工地上的所有人——包工头、工友们，甚至包工头的妻女——在面对宪兵的审讯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枪响的时候一片混乱，那个叫法特玛的女人立刻就消失了。没有一个人出卖真相，没有一个人指向那根即将浇筑的混凝土立柱。没有人逼迫他们这样做，没有人教他们如何应对，他们只是凭着最朴素的人性直觉，选择保护一个素不相识的革命者。这种集体的沉默，这种自发的守护，比任何宏大的革命叙事都更加震撼人心。他们朴实、善良，他们弱小得微不足道，但他们分得清什么是压迫，什么是正义，他们懂得在强权面前，弱小者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和沉默。

影片的结局似乎是开放式的。法特玛最后究竟如何从已经开始浇灌的混凝土立柱中脱身，导演并没有给出清晰的交代。在上海影城的映后见面会上，有观众向导演雷斯·塞里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导演的回答意味深长：“我不在现场，我也不知道。”这句话看似“玩笑”，其实恰恰道出了本片最核心的命题——法特玛之所以能够脱险，并非因为某一个人的英勇，而是因为那么多普通人共同的守护。她的生还，是无数双沉默的手托举起来的。在那个无人看见的夜晚，真正的英雄就是那些在黑暗中、在恐惧中、在枪口下，依然选择守护他人的人。这是正义所激发的人性光辉，是压迫之下依然不屈的良知。《无人看见的夜晚》最动人的，不是法特玛的逃亡故事，而是那群默默无闻的建筑工人——那些无名英雄——如何在黑暗年代里，用人性的光芒照亮了一个人的生路。他们值得被记住，值得被致敬。

周馥的遗愿为何是建一座医院？

周海滨

也是在这一年，周馥了却一桩半生心事——迎母侍养。自同治四年祖父弃养，痛感“禄不逮养”的他常年羁旅，内心常负荆棘。如今既已稍立根基，总算将“显亲扬名”落到实处。当白发苍苍的老母蹒跚入署时，周馥心中那块悬置多年的巨石，才算稍稍安放。

次年年初，随着卢沟桥石堤决口工程告竣，周馥终以道员留直隶尽先补用，摆脱了“候补”的虚衔尴尬。然而，治水之功未及细品，北方的肃杀之气便给了他沉重一击。久居皖南的母亲极不耐寒，干燥的风沙与迥异的饮食，令老人即便裹着厚重的棉袍，也难以安身。周馥不敢耽擱，当即请假护送南归。

车马行至山东临清，老母执意不令儿再送。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周馥驻足良久，深深一揖，转身登车。此后数年，周馥自著年谱

中再未提及是否归乡探母，字里行间，尽是无可奈何的疏离。

光绪四年（1878）正月，一封家书自皖南建德纸坑山而来。信为乡间塾师代笔，然墨痕浅淡，满纸皆是老人的虚弱与思念。周馥读罢，心知恐非吉兆，即刻禀报李鸿章，以“母病笃”乞假归省。

按清制，母丧丁忧需去职守制二十七个月。李鸿章接帖时，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效仿张居正“夺情”，强留这位河工海防的臂膀。但他深知周馥侍母至孝，终究未曾开口，只叹息一声，准了长假。

周馥星夜兼程赶回建德，推开家门，却见母亲已缠绵病榻，形销骨立，往日慈容被病痛折磨得枯槁如柴。六月十一日，母亲撒手人寰，享寿六十二岁。

“伤哉痛哉！我母一生艰苦。”

周馥在年谱中录下此句时，笔尖想必是颤抖的。他再一次自责“禄不逮养”，悲恸之余，对官场追逐之心亦淡去大半。

这份剜心之痛，更源于两次致命的误诊。母亲久咳体弱，乡下庸医不明病理，妄用燥烈之药“化痰”，反致耗伤阴液，病情陡重。祸不单行，其子周学涵（乳名安瑞）染上温病，乡医囿于陈规，将温病误作伤寒，妄投麻黄、桂枝强发其汗，无异于抱薪救火。周馥虽急改寒凉解毒之剂，奈何为时已晚。四月十七日，年仅十六岁的安瑞夭折。

丧孙之痛令病重的周母彻底崩溃，饮食顿减，终致痰厥暴脱，含恨而终。接连失去至亲，周馥痛定思痛，深知“乡无良医”比“无药”更可怕。庸医杀人不用刀，却往往披着“祖传秘方”的外衣。他曾刊印验方以济乡人，然收效甚微。于是他暗自立誓：“欲为永久医院，施诊施药。”

只叹此时正值丁忧，宦囊羞涩，宏愿难酬。晚年的他在年谱中留下遗言：“他日子孙为我偿此愿，胜于诵经念佛超度先人万万矣！”

